

在那遥远的地方 中华民族挺起脊梁

原子城传奇



新华社记者吕雪莉、刘江

青海金银滩，国营 221 厂，中国原子城。这里是强国之梦开始的地方，这里是中华民族挺起脊梁的地方。

半个多世纪前，无数顶尖科研专家、技术人员、干部职工、部队指战员，在这里头顶蓝天，脚踏荒原，开启了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传奇之路。

昔日捍卫森严的军事禁地，早已揭开神秘的面纱，成为青海的旅游胜地。但使命与光荣从未远去，“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攀高峰”的“两弹一星”精神永放光芒。

隐姓埋名 共赴神秘禁区

具有象征意义的“596”之路旁，一位短发的年轻妻子正要将信投入邮箱，她神情专注，饱含深情。

离她不远处，一个男人倚墙专心读着一封信……

在原子城纪念园里的这座雕塑，生动再现了那个火烈年代中，一个真实而感人的故事。

一对新婚燕尔的夫妻，分别接受任务各自奔赴“那遥远的地方”。从此鸿雁传书、互诉衷肠。

原以为各自天涯。在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庆功会上，他们惊喜地发现了对方：原来两人工作的地方，只不过隔了一堵墙。

原来，他们寄出的信件会发到北京，再寄回来……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究竟是谁，难以说清，因为类似的事情当时很多。”面对记者的疑问，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接待中心主任王致玲这样回答。

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的金银滩草原，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国营 221 厂旧址。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均诞生于此，故这里被誉为“中国原子城”。

1958 年，面对西方核垄断、核讹诈的威胁，党中央决定在这里建立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对外称“国营 221 厂”“青海矿区”。

广大科技工作者闻令而动，告别亲人，奔赴高原，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草原大会战。

世界知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1961 年放弃国外的优越条件毅然归国。为参加核武器研究，他改名王京。

从此，他隐姓埋名 17 年。

“王淦昌到哪去了？”每当有人这样问时，他的妻子总是说“到邮箱里去了”，因为她也只知道王淦昌的通信地址和信箱代号。

……

为了国家之荣光！这是参加核试验科学家



这是 3 月 5 日拍摄的原子城纪念园内名为“邮箱”的雕塑。 新华社记者吕雪莉摄

的共同心声，他们不畏强权、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团结拼搏，守护了共和国的和平与安宁。

以身许国 共圆强国梦

空旷的原野上，两排钢筋混凝土立柱，矗立在长满锈迹的铁轨旁，斑驳而沧桑，无声地诉说着过去的辉煌。

这里，被称为“上星站”，是 221 厂最核心的厂区之一。

“可以说，这里是我国强国之梦开始的地方。”“两弹一星”理想信念教育学院专职教师马晓燕说。

当年，这个草原深处的小小站台，先后将我军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以及多种型号的核产品，运往核试验场和它所装配的部队。

1964 年 10 月 16 日 15 时，罗布泊上空一声巨响，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它向世界庄严宣告：站起来的中华民族拥有了自己的原子弹！

1967 年 6 月，由 221 厂承担研制的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221 厂的建设者们“三顶帐篷”起家，先生后生活，合力攻坚，艰苦创业，用智慧和生命圆了中国人民的核武器之梦，换来了共和国的

尊严和强大，也换来了人民的幸福和安宁。

耸立在西海镇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铭记着他们的丰功伟绩。

郭永怀，是“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获得烈士称号的科学家。

1968 年 12 月，他从导弹试验基地返京途中遭遇空难。危急时刻，他与警卫员牟方东紧紧拥抱，保护着夹在胸前装有绝密数据资料的公文包，遇难时年仅 59 岁。

86 岁的刘兆民老人，是原 221 厂的退休职工。

他早年大学毕业后就从事原子弹研究。1963 年初他来到金银滩，在二分厂研制炸药，直到退役。

“那时条件非常艰苦，住过帐篷、干打垒。但是能参与国家的尖端科研工作，我非常自豪。”

没有当年原子弹、氢弹的成功，就没有今天强大的中国。回首那些火热的岁月，86 岁的老人无怨无悔，激情满怀，“如果现在需要，我还能干。”

以身许国！无数科技工作者抱着振兴中华的理想，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强不息、无私奉献的创业精神，在这片神秘禁区，奉献与坚守了一生。

化剑为犁，为了和平与安宁

遵循和平时期“化剑为犁”的思想，1987 年，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下文撤销 221 厂。

1995 年 5 月 16 日，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已完成历史使命全面退役”的消息。

这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退役的核工业研制基地。曾经的神秘禁区，成为海北州州府新址——西海镇，逐渐向世人开放。

在地图上一度消失的金银滩，伴随着西部歌王王洛宾那首脍炙人口的情歌《在那遥远的地方》，迎来了四海宾客。

金银滩草原重归宁静，牛羊遍地，牧歌悠扬。金银滩草原的牧民们迎来了富裕祥和的新生活。

如今，行走在西海镇，不时会“邂逅”当年 221 厂的遗迹，随处可见的雕塑、纪念碑、纪念馆、纪念园，当年的图书馆、电影院、将军楼。

遍布草原的厂房、车间静静矗立，当年的标语仍清晰可见。

丰碑无言。代表“圆梦”的纪念碑圆球下方，棕红色的盾牌上，镌刻着 9 颗圆钉和展

翅飞翔的和平鸽。

它让世人铭记：中国人研制原子弹，并非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和平。

逐梦新征程，“两弹一星”精神永放光芒

从事水利工作的楚殿琪师傅站在“上星站”铁轨旁，望着苍茫的草原，久久伫立。

8 年来，只要有空，他都会来这里看看。这次，他带着两个年轻同事来，让他们也感受老一辈创业的艰辛。

“这是中国人民挺起脊梁的地方，虽然那段时光已成为历史，但是不能忘了老一辈的艰辛付出，要继承和发扬他们艰苦创业、为国争光的精神。”

总有一种精神，激励我们前行。

“这里铸就了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挖掘好、传承好这些精神财富，是我们的使命。”“两弹一星”理想信念教育学院副院长周广静说。

此前，周广静在原子城纪念馆工作了 17 年。纪念馆建馆 18 年来，已经有 300 万听众聆听了“两弹一星”精神的宣讲。

目前，以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为主线，以原 221 厂旧址为载体，学院已开发出原子城纪念碑、一分厂、二分厂、上星站等十多处现场教学点。

“政治上得锤炼，思想上受洗礼，精神上得激励，使命上得强化。”“两弹一星”理想信念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张海旺说，2020 年，学院培训各类参训人员 3000 余人次。

“之前并不太了解原子城的历史，深入学习才体会到辉煌背后的付出与艰辛。每次看资料，都心潮澎湃。”

来自云南的“95 后”女孩孙晓晓，去年通过考试来到“两弹一星”理想信念教育学院，成为一名专职教师。

她说，每个分厂，都有牺牲和奉献。“英雄之所以是英雄，是因为他们始终在危险的最前沿，是因为他们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热爱。”

二分厂发生过爆炸事故，4 位年轻的技工工人当场牺牲。由于事故太惨烈，只能把他们的骨灰平均分成四份寄回家中。后来，一个年轻逝者的父亲又将儿子的那份骨灰送回了基地。“他说，儿子是为国捐躯，他要让儿子的英魂陪伴自己未竟的事业……”

讲着讲着，孙晓晓热泪盈眶。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和平年代同样需要英雄情怀。

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下者，我们的天下。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向英雄学习，景仰英雄，让他们的精神照亮我们逐梦的征程，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孙晓晓激动的声音里，满是坚定。

新华社西宁 3 月 16 日电

一张列席证诉说历史风云

俄文印刷、手写签名、一张黑白照片……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陈列保管部主任李勤戴好白手套，从一个蓝色小箱子中轻轻拿出一张泛黄的列席证。

“这是一个长方形的纸质证件，俄文印刷的，上面印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用订书钉固定了一张邓颖超同志的黑白照片，加盖有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徽章。”李勤介绍说，这是 1928 年邓颖超参加共产国际六大的列席证。此行，邓颖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陪同周恩来参加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 年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野蛮屠杀，而党内对革命形势任务的认识还存在分歧和争论，召开新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刻不容缓。

“当时由于国民党统治下的白色恐怖太严重了，而刚刚遭受重大损失的中国共产党又迫切需要有一段比较充裕的时间和一个安定的环境，来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研究并部署今后的工作。因此，中共中央报请共产国际同意后，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为了筹备并出席党的六大，周恩来、邓颖超从上海出发，辗转前往莫斯科。”南开大学教授张健说。

后来，邓颖超也回忆道：“我们党要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由于中国的环境不可能在国内召开，故决定在莫斯科举行。”

这是邓颖超第一次前往苏联，也是她多年后仍记忆犹新的一次冒险。

1928 年 5 月初，周恩来与邓颖超乔装成一对商人夫妇，从上海乘坐日本轮船前往大连，再



这是 1928 年
周恩来邓颖超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列席证（2020 年 12 月 23 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李然摄

经东北转赴莫斯科。当轮船停靠在大连码头、他们准备上岸时，遭到当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的人近身盘问。对于一系列盘问，周恩来镇定沉着地应对。

邓颖超回忆：“我住进旅馆，等候周恩来同志回来。他是凶是吉很难预测。”经过一番斗智斗勇，他们最终成功脱身。

“脱险后，周恩来和邓颖超辗转来到哈尔滨，在火车站等到了李立三。随后，他们乘火车到达满洲里。在苏联方面的帮助下，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和其他参会代表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险阻，成功越过国境，汇聚莫斯科。”李勤激动地讲述着这段历史。

1928 年 6 月 18 日至 7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五一村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 142 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 84 人。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等重大问题做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在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上澄清了党内长期存在的错误认识，大体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中国革命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张健介绍。

历史风云变幻，革命丰碑永存。穿过历史的尘埃，从这张小小的列席证，仿佛依稀可见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

李勤告诉记者：“这张列席证一直珍藏在邓颖超卧室中的私人保险柜里，她曾说当时列席的人很少，能保存下来不容易。邓颖超去世后，她的秘书将这张证件捐赠给了筹建中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记者刘元旭、邵香云、周润电）
新华社天津电

红色百宝 奋斗百年

走进湖南醴陵仙山公园北门，拾级而上，便能看到矗立在醴陵市烈士陵园中的一对革命伉俪雕像：手戴镣铐的夫妇二人相互依偎着，坚定地看向远方。

这对夫妻，丈夫名叫陈觉，妻子名叫赵云霄，他们的两封血泪书信为世人传颂：一封是丈夫在就义前写给妻子的诀别信，一封是这位妻子留给尚在襁褓中的孩子的遗书。

陈觉，原名陈炳祥，1907 年生于湖南醴陵，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赵云霄，原名赵凤培，河北阜平人，1906 年生，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 年，因为共同的信仰，两位相隔千里的年轻人聚到了一起——陈觉、赵云霄作为第一批先进的中国青年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校期间，二人在学习上互相帮助、在生活上互相关心，最终结为革命伉俪。

1927 年，中国革命进入低潮，留苏的党员学生纷纷被派遣回国，从事苏维埃运动。陈觉、赵云霄两人一起回国，到陈觉的家乡醴陵开展革命斗争。“你路过家门而不入，与我一路南下，共同工作。你在事业上、学业上所给我的帮助，是比任何教师任何同志都要大的……”陈觉在写给妻子的遗书中如是说道。

1928 年，这对革命夫妻在分离奔波中先后落入敌网，均被关押在长沙陆军监狱。

在狱中，任凭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问，陈觉和赵云霄始终宁死不屈。多次

审讯未果后，反动当局以“策划暴动，图谋不轨”的罪名，判处陈觉、赵云霄死刑。

就义前 4 天，陈觉写下给妻子的诀别信。在信中，他说：“云！谁无父母，谁无儿女，谁无情人，我们正是为了救助全中国人的父母和妻儿，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我们虽然是死了，但我们的遗志自有未死的同志来完成。大丈夫不成功便成仁，死又何憾！”

这封不足 500 字的诀别信句句带血，行行含泪，凝结着如陈觉一样的革命先烈们愿为无产阶级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坚定决心和昂扬斗志。

1928 年 10 月 14 日，陈觉在长沙慷慨就义。近 4 个月后，赵云霄在狱中诞下一名女婴，取名为“启明”，意为在黑暗中盼望破晓。

启明满月不久，赵云霄就接到了死刑判决书。临别之际，她给女儿写下一封绝笔书。在信末，赵云霄告诉女儿：“你的外祖母家在北方，河北省阜平县。你的母亲姓赵。你可记着，你的母亲是二十三岁上死的。小宝宝望你好长大成人，且好好读书，才不负你父母的期望……”

1929 年 3 月 26 日，在给襁褓中的女儿喂过最后一口奶后，赵云霄毅然走上了刑场。令人心痛的是，小启明因体质弱多病，4 岁便夭折了。

如今，在位于陈觉家乡的烈士陵园里，绿荫满园、安静庄严。

在陵园工作已有十年的管理所长杨云志已经无数次读过陈觉夫妇的遗书。“但每次读，我都仍会被烈士坚定的革命信仰和强大的内心所打动。”杨云志说。

（记者张格、魏玉坤）
新华社长沙电